

漂流人生的光明與幽微

—落腳城市的現代性啟示

【銀椽獎·張家榮】

壹、前言

桃園忠貞新村有許多雲南米干的專賣店。這個巷弄交錯的小聚落，源起是 1949 年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後，一批在滇緬邊境的軍民所組成的「雲南反共救國軍」堅持奮戰，後因緬甸政府向聯合國控訴中華民國軍隊入侵緬甸國土，只得撤退來臺，便在桃園中壢興建忠貞新村，安置這些異域孤軍。

如今忠貞新村已經看不出甚麼眷村痕跡，留下的是掛滿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國旗屋」，還有香味四溢的滇味小吃，而街上大多是外牆斑駁的老舊建築。但並不是說這個社區再也沒有生命力，這個平日中午，餐廳裡滿滿的食客，似乎沖淡了移民大河劇的苦澀。我看著這間餐館牆上一張張黑白照片，上頭是當時駐守在赤化中國的軍隊，還有撤退行軍的漫長人龍。餐館裡人聲鼎沸，白碗裡呈的是純白米干、血紅辣椒和金澄醬料，這種鮮明奪目的融合，象徵異域也終成家鄉。

臺灣雖然小，卻是個道地的移民社會；而忠貞新村，或許正是臺灣版本的落腳城市。翻開 Doug Saunders 的《落腳城市》(Arrival City)，我才發現，原來歷史上像臺灣這樣以國家力量有計劃地為移民建置聚落的國家並不多（國民黨政府當時出自安撫聯合國，及維護黨國體制的政治性考量才作此決策）；而世界上的通例，是人們為了討口飯吃，選擇

離開原鄉搬到新天地。這些聚落與大城市的距離並不遠，甚至可說是後者的衛星城市，透過與核心都市的附生，以及與家鄉的連帶，落腳城市不但成為異鄉人的棲身之地，也是他們實現夢想的應許之地。然而，因為這些聚落通常缺乏都市計畫管理與基礎設施建設，人口與建築漫無節制地增生，隱藏汙染及犯罪因子，導致落腳城市的惡名昭彰。

從東方到西方，自山巔至海邊，落腳城市的形成，代表與「現代性」(modernity) 概念相關的一套經典命題，如何強而有力地作用於我們每個人身上，並體現於為自身未來鬥爭的實踐。因此，我認為《落腳城市》這本書所談論及訴求的，不只是為我們指引都市規劃政策或論述經濟規模發展的定理，更是人類如何找尋自我價值的現代啟示。

貳、遷移、現代性與人的價值

關於都市遷移這件事，必須從「現代性」的出現講起。自 17、18 世紀開始，受到圈地運動及工業革命等政治經濟制度劇烈變革的影響，歐洲大量人口由鄉村湧入都市。以重地農耕與家庭經濟的傳統生活方式逐漸瓦解，替代的是大都市的興起，而都市興盛與資本主義的結合，又造就了西方「現代性」的興起。

「現代性」這個概念指涉一個現代社會都市化、工業化、理性化、科層化的特質。既然有「化」這個詞，就表示它是一個動態且持續的過程。與傳統農村生活相較，在都市裡的人們在一個截然不同的日常倫理當中，這種新倫理要求我們珍惜寶貴時間、理性地錙銖必較賺取財富、習慣以科學角度思考而非宗教、組織精細分工以達成最大效率 (efficiency) ……。當今，我們每個人都無所遁逃，即使終生住在鄉村離島的人（如蘭嶼達悟族人或雲林麥寮的老年人），也很難完全不被資本主義與科學理性這種巨大結構影響，現代性儼然是莫之能禦的歷史洪流。

這種歷史推進的劇變與個人命運的轉折緊密鑲嵌。Marshall Bauman 為這段大破大立的劇變有著精彩的描述：「當今全世界的男男女女，共

享了一種重大的經驗模式——空間與時間、自我與他人、生機與毀滅的經驗。我稱這種經驗為『現代性』。所謂的現代，是發現自己置身於這般環境中：它許諾了我們冒險、動力、歡愉、成長、我們自己與世界的轉變——然而同時，它亦威脅將摧毀我們擁有的、所知的一切，與我們的一切身分。現代環境與經驗超越了任何地理與族群的邊界，階級與國籍的差異，宗教與意識形態分野：就此而言，現代性可說是統一了全人類。但這是種矛盾且分裂的統一；它將我們全都傾洩進了永恆的分解與更新、鬥爭與矛盾、曖昧與悲苦的大漩渦裡。」Marshall Bauman 這段字裡行間有著普世的味道，彷彿是對人類這個物種作出具歷史價值的告解。18 世紀的啟蒙運動教育人們勇於求知求真，珍視自身價值，進而掌握自我命運、擺脫他人宰制，於是乎，追求「人」的價值，成為現代性的精神底蘊。人類從鄉村移動到都市的過程，雖不能說是全然心悅誠服，但「想要成為自己的主人」的想法，卻是無庸置疑的。

而此種精神也代表都市以新的秩序運作。英國社會學者 Anthony Giddens 更進一步將這種秩序視為權力配置的型態：「人們可以說，城市是在現代資本主義的影響下破土而出的。在社會情境中，現代資本主義促成了一種新型權力容器，即民族國家，同時，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受到這種權力容器的作用。城牆的消失伴隨著一種高度完善的管理秩序的鞏固，這種管理秩序嚴格界定了它運作的領土疆界。」他揭示了都市生活權力運作的底細。城市的興起不是中性真空的，而是與一整套價值體系及權力資源密切相關，用比較學究的詞語來說，即城市是由資本主義與國家機器共同打造的，資本主義預設金錢流動與勞動市場的架構，國家機器則劃分政治權力及合法暴力的界線。來到都市的人，大多相信自己能在其中表現發展自我、攫取更好的生活機會、樂於投入競爭場域，這些共識與價值打造出一套遊戲制度。這套規則正是權力與資源分配的規則，也是階級分化社會形成的原因。

把握了這個概念，就能理解遷移對於個人有多大的吸引力。《落腳城市》第五章便細緻地爬梳了西方社會這段經典的現代化歷程。從歐陸的巴黎、倫敦，乃至北美的多倫多與芝加哥，這些大型都會的擴張史，

說明生活在現代性中的人類如何透過遷移來驗證自我，從原本在鄉村被奴役及飢渴的生活，往都市找尋自由的出路。長久以來，東方人面對強大的西方文明，無論擁抱或拒斥，不免好奇：「西方何以成為今天的西方？」或許，本書將法國大革命與落腳城市居民起義連結可作為一個註腳，西方社會的都市化不僅是讓歷史推進的重要力量，也賦予個人勇氣推翻顛覆既定結構。就是這個歷程在兩、三百年以降的世界史舞臺上反覆重演，西方遷移史這樣具人文主義的古典命題，即便放在今天看來仍是歷久彌新。

然而，儘管古典命題如此迷人，具有不可避視的人文精神與樂觀主義，我們對遷移的檢視角度仍應與時俱進。事實上，全球化時代的人們的移動，或許不是那樣充滿光明，有時還那麼帶點苦澀哀傷。

參、行路難：全球化的移動

臺中火車站附近的商圈吸引了許多東南亞移工聚集於此。每到假日的第一廣場，這裡出現的不再是放假等著搭火車回家的成功嶺大專兵，或是排隊看電影聽歌的中產階級，這個臺中市的前精華地段，如今擠滿膚色黝黑、操著家鄉話的跨國移工（當然可想見的，這些移工中不可能有披著高加索臉的白領勞工）。

有時我下班後會來這聽演講，順便散步去「宮原眼科」喫水果冰淇淋，我發現這個舊城區已從廢墟上生出了綠苗。常聽臺中人道：「臺中中區已沒落了！」這樣的喟嘆其實半對半錯，對的是這裡許多舊百貨公司及辦公大廈被閒置後，確實並未活化而成為廢墟；錯的是，這裡早已成為南洋苦勞階級的新天地。第一廣場現在開設許多販售電話卡、印尼泡麵和南洋小吃的小商店。這些移工前來這找尋與家鄉的聯繫管道，包括有形的物質媒介或是無形的心靈慰藉。這裡是他們趁著假日偷喘口氣的樂園，透過人際網絡的擴張，中區的都市地景有如插枝般多元豐饒，這裡既有日據時代的典雅建築，也有傳統福佬移民的騎樓，現在更拼貼上東南亞文化。這裡的有趣之處不是雄偉的豪宅富邸所能言喻，而是巷

弄裡需要稍微費心挖掘。誰知道在我小時候中區曾是霓虹奪目、人車爭道的不夜城，這裡曾經是一夕暴富的臺灣縮影。

我從中區地景的演變體認到，一個城市不會因為混雜而變得凌亂，反而是刻意隔離才會變得死氣沉沉。舊城區地景的此消彼漲，人的主體與價值才逐漸浮現出來。臺中市區的發展隨著市政府主力開發屯區，人口與資源越來越往西邊與北邊集中，新型的百貨商場與綠地公園看似氣派萬千，卻也少了歷史感，而當舊城區不再是眾人目光聚焦之處，異國文化則趁虛而入，理直氣壯地紮根茁長（儘管長久以來臺灣人大多將這種現象視為可怖的侵略，是低等文化的招搖入市，而非應該等量齊觀之）。這也是現代性移動的另一個啟示：移動的人們不可能在來到新所在後被束縛在原地，而是尋找新出路，在異鄉拚搏。

事實上，臺灣的移工開放政策與外來勞動人口，反映了這個島國鑲嵌在全球化生產體系的歷史必然性，作為一個新自由主義與右派思想從不退燒的國家，我們思索的從來都不是該不該開放，而是該開放多少。從 1970、80 年代以降出現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現象，越來越廣泛的人口及資本流動，已成為當代衝擊改變人際關係、生產消費行為及國家統治思維的重要力量，移動（尤其是跨國、跨文化的移動）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權，而是你我都可能遭遇的命運。

可是，全球化的移動不只是坐飛機四處遊覽、打卡拍照上傳而已，Zygmunt Bauman 就區分全球化下兩種性質迥異的移動者：一種是第一世界中的「觀光客」，他們以四海為家，搭乘頭等艙或私人飛機，這個世界的商品、資本與金融打破藩籬。另一種「第二世界」則充滿限制：移民控制、居民法規、淨空街道，這世界裡的移動者「盲流」則像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我們實在很容易就可以把臺灣的 50 萬「外勞」大軍歸類至後者。這也是為何，當我們閱讀商業雜誌上成功人士的豐功偉業時，要將它除魅化，視為辯證及角力下的結果。因為個案的成功神話，實在是建立於無數人的犧牲與挫敗上。全球化的移動有其神話特質，亦有險惡噬人之風險。

《落腳城市》全書有關移動歸因的論證都圍繞在這個命題上：鄉村

民眾之所以離開原居地搬到落腳城市，是因為生活過不下去，或至少想要過更好的生活；而對於落腳城市居民引發的衝突，Doug Saunders 也認為「落腳城市的居民……又飽嘗這種危機所導致的糧食價格飆漲與都市失業現象之苦，這麼一來他們通常就會採取行動」(專書，頁 178-179)，這種說法有陷入經濟決定論 (economic determinism) 的危險，經濟因素當然很重要，但若是將人的遷移選擇與政治行動都視為經濟因素的附庸或結果，就很難真正透析許多社會行動。

藍佩嘉的《跨國灰姑娘》一書對東南亞家務移工的經濟推拉理論(這種理論大意是說，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越落後，那麼這裡的居民就越可能選擇到經濟發展較發達的國家去工作，這兩種力量猶如移出母國與移入國的經濟推拉角力)提出質疑：難道讓人遷移的因素只有經濟嗎？統計數字顯示，輸出移工最多的印尼與菲律賓並非東南亞最貧窮的國家，而菲律賓移工大宗也不是來自該國的窮鄉僻壤，而是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較高的都會邊緣地區。她透過與女性移工的訪談發現，對現代性的想像與渴望是驅使她們前往其他國家工作的意願，隨著全球化傳播科技的進步與當代消費主義的發展，海外工作提供了東南亞女性一個可以親自體驗現代性的機會，此外，海外工作也讓這些女性得以暫時逃脫家鄉的性別禁錮與婚姻控制，在陌生的國度中獲得個體解放。經濟固然是造成遷移的重要因素，但絕非唯一因素。人類行為總是在特定時空脈絡與既有結構下形塑而成的。

顯而易見地，全球化時代的移動依然召喚我們對現代性的想望。然而，受到現代性召喚的人們，來到新世界後，真的能過上幸福快樂的日子否？如同《落腳城市》第八章所討論的，移動者與新世界之間的衝突與張力，是令人傷神的難題。來到德國克勞茲堡 (Kreuzberg) 落腳的土耳其人，竟生活得還比住在母國的土耳其人還差，追根究柢，是德國的移民政策不將這些土耳其人視為其公民的一份子，這也形塑德國對於落腳城市移民的政策規劃，排斥這些居民的需求，如政治機會或公民權利，導致這些土耳其人無法憑一己之力向上流動，漂流至異鄉後仍在漂流。缺乏公民身分的人注定缺乏認同 (identity，事實上「identity」這個

單字同時有身分及認同之意)，無論是對新國度還是對自己。

《跨國灰姑娘》的書名是很具巧思又帶點感傷的。東南亞女性移工抱著對現代性的美夢來到香港、韓國或臺灣等地，以為自己能站上全球化的灘頭，躋身 Bauman 所言的「觀光客」，掙脫性別禁錮，重拾身為(女)人的價值，但現代性既是燦爛的神話，弔詭地也是現實的劇本，當她們擁抱資本主義與全球化奮不顧身來到這些國家幫傭，殘忍地揭露了她們也正從事傳統定義的女性家務勞動，並且這種家務勞動更是以金錢衡量的，為了掙脫性別枷鎖而移動，卻又被綁在雇主家中，成為勞碌奔忙的灰姑娘。

全球化時代中的移動有其風險，不只源自於前述如東南亞移工個人在異鄉所可能遇到的未知挑戰，還加上受經濟及文化全球化下的多變環境影響。以《落腳城市》第 2 章深圳在 2008 年後的發展停滯為例，乃因地方政府漠視鄉村移民社區的重要性，中國「農民工」因為在原鄉戶籍登記為農業戶口身分，即使到都市工作居住，也無法自由選擇戶籍地，無法成為真正的都市人，享有都市居民權益。這種先天的身分汙名，不但讓他們在城市中受到萬般歧視，事實上，我們若從中國在今日全球經濟體系中所扮演的地位來看，可以發現像深圳一樣在「改革開放」政策下納進世界代工體系的都市，受到世界景氣波動影響的機率與程度是越來越大的，鄉村移民面臨的風險，或許已不再只是地方政府或國家能夠準確預測及防止的。這裡強調「風險」(risk)與全球化的關聯，正是 Ulrich Beck 批判的，經濟全球化給予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沃土，將投資、生產、行銷及居住處設於不同國家及城市，哪裡提供廉價就往哪裡去，這些資本家住在先進國家享受福利，卻掏空了其他國家及其人民的利益。人類被分為兩種：一種是能夠掌握關鍵資訊技術並從中套利的人，但更多的人卻是第二種：隨時被淘汰成失業者的人。

全球化社會其實就是風險社會。自從金融風暴之後，人類逐漸對資本主義的極限與矛盾看得透徹，沒有一個完美無缺的經濟系統能許諾我們美好未來，全球化的確帶給我們許多便利及好處，可是內部分配不均與危機爆發的風險卻令人不可忍受。《落腳城市》對遷移的樂觀想法，

建立在只要賦予這些居民政治機會與公民身分，就能解決一切苦難，但切入全球化與風險社會的視角之後，卻很難這麼一筆帶過。欲解決這種苦難，我們需要更審慎的方案。

肆、遷移與現實苦難：經濟外的社會受苦

《落腳城市》一書所關心的是，鄉村人往都市遷移後能否憑一己之力「翻身」成為中產階級。「翻身」就是社會學「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概念，社會流動對臺灣人一直都是迷人風行的咒語，臺灣人特別熱愛「從黑手變頭家」。而《落腳城市》對人的關懷也集中在遷移者的經濟壓力能否透過移居城市後舒緩，並創造比父執輩或鄉村的舊日子更好的經濟生活。

如同我在上文所說的，《落腳城市》看待人的遷移動力有經濟決定論的嫌疑，面對城市中所面臨的挫折與苦難，也似乎侷限在經濟壓力，對於社會的、心理的、肉身的苦難並不甚著墨。

社會學家處理人的受苦並不那樣簡化。Max Weber 認為，隨著現代社會資本主義興起，新教徒原本依恃的宗教價值理性，已逐漸被重視手段的工具理性所取代。我們享受理性化帶來的便利，卻也因為現代組織的科層制、分工制、等級制，陷入被系統與規律所困的泥淖，被量化評價和形式主義網綁，也就是「鐵籠」(iron cage)。我們忘記了理性的原衷，即重視人的價值。Weber 看到的是，除了被剝削及無從翻身的經濟壓迫之外，現代社會人的束縛處境，還可能具有社會與心理性質。「社會受苦」(social suffering)的概念，正是醫療社會學試圖另闢蹊徑，來看待身體疼痛別於生物性病因的社會成因。

劉紹華在《我的涼山兄弟》這本細緻的民族誌裡，探討中國四川的少數民族諾蘇人(彝族)為何成為海洛因及愛滋病的雙重重災民？她透過多年的田野蹲點與深度訪談，發現中國從改革開放政策發展資本主義後，都市生活的現代性吸引鄉村人口遷往都市，而傳統諾蘇青年有類似「成年禮」的習俗，透過到城市裡闖蕩的方式驗證自己的男子氣概。然

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缺乏一技之長的諾蘇青年，到大城市裡只能做些低技術、勞力密集的零工，難以向上流動。在發展受挫下，諾蘇青年將金錢投注在海洛因上，以獲得心靈慰藉。或許我們很難想像為何有人需要靠毒品（菸、酒、暴飲暴食）這類傷身物質來紓壓？然而，我們應該從諾蘇人的世界觀及物質觀來解讀這段受苦歷程。海洛因在諾蘇人的文化脈絡裡並非惡物，在 19 世紀中國的鴉片風行下，四川成為罌粟的重要產地，也為當地居民帶來龐大利益，鴉片這種「毒品」在諾蘇人的眼中是高級的奢侈品。

因缺乏對毒品成癮性的認識，以及城市生活的挫敗，諾蘇青年將偷竊得來的錢花在購買海洛因吸食上，又因為了省錢而採取注射靜脈的方式使用毒品（這種方式的使用量比吸食較少），在無法取得清潔的吸食器共用針頭而交叉感染下，導致諾蘇青年的愛滋感染率節節高升——諾蘇人佔四川人口的比例不到 3%，但 2001 年的調查發現諾蘇的愛滋感染者佔了四川的 59.56%，2007 年，涼山的愛滋感染通報案數已增加至 5,090 人。

現代性讓諾蘇人進入城市嘗試個體性的冒險之旅，體驗現代性解放，也讓他們蒙受其陰影。「社會受苦」概念的洞見在於，結合個人肉身苦痛與社會結構，以透析看似個人不自愛的行徑，事實上是這個社會迫使他們做出這般選擇。諾蘇青年的肉身受苦固然來自毒品成癮與愛滋病帶來的病痛，但更可能與他們所處的社會結構與劣勢位置相關。

現代性是一個不斷推進的動態過程，而不是靜態不變的狀態，這個動態過程也不斷將世界上更多的人口捲入，當《落腳城市》揭示著，全球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從鄉村遷至都市，正表示追求現代性的路上並非坦途，這裡頭隱含著性別、族群與階級等社會屬性的不平等。

公民身分的確是《落腳城市》疾呼力陳遷移者應該爭取或被賦予之物，因為擁有公民身分是進一步取得其它機會與資源的基礎。然而，現代民族國家在面對移民者時，總是區分開放權利的種類、多寡及對象，以建立「哪些人有資格成為我們」的認同體。以臺灣的移民或移工政策為例，曾熾芬的研究指出，臺灣政府以「客工」計畫（指暫時性工作，

而非長期移民)做為外勞政策的基調，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多數討論都預設了臺灣社會是種族同質性的、不宜積極引進長期移民，而對於外勞會對臺灣社會產生的「社會問題」，主要集中於他們對於臺灣種族同質性會有的衝擊。

伍、政策方向：為移民培力

《落腳城市》第1章及第9章首尾呼應地揭櫫這本書的主題：促進社會流動。作者認為落腳城市在促成社會流動應發揮4個功能：

- 一、創造及維繫一套人際網絡，以聯繫鄉村、落腳城市及既有都市。
- 二、落腳城市發揮入口機制的功能，以廉價住宅及低門檻工作吸引鄉村人口移入。
- 三、具備都市立足平臺的功能，透過非正式資源讓居民創業或購屋。
- 四、提供社會流動管道，讓人晉升為中產階級。

社會學對於移民社群發展商業行為的現象有豐饒的研究。我們常看到美國影集中華人、印度人或韓國人對於經商這件事不但做得有聲有色，而且還成為大眾傳播媒體中一種鮮明的族群形象，也凸顯韓裔、華裔、古巴裔等外籍移民，比一般美國公民有更高的創業率，例如開洗衣店的中國人或開咖哩料理店的印度老闆。這個透過落腳城市（如唐人街、韓國城）聚集在一起，並彼此協助成為團結的經商團體，並不是他們天生流著愛做生意的血液，而是在較豐厚且團結的「族群資源」下促成經商行為。曾熾芬從洛杉磯的華裔移民創業家的研究發現，移民企業的產生並非只是個別企業家的成就，也是移民族群的集體創作。

簡而言之，落腳城市若能提供讓人翻身的機會，不僅是因為個人眼光獨到或堅苦卓絕的特質，而是在於這個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是否足夠強健，能否真正讓人在其中自由發展。這個市民社會應有良好的基礎建設、公民權利、信貸制度等重要機制，移民便可憑藉之力爭上游。創業所需要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不同於經濟學上的金錢資本，它強調的是一個人社會關係網絡的反饋，也就是說，社會資本講求集體

的努力、集體的許諾。

作為一種過渡機制，落腳城市提供了居民於其中互助及助人的平臺，這絕對需要國家角色的積極肯認。我們可以在法國的金字塔社區、德國的克勞茲堡、委內瑞拉的貝塔瑞或伊朗的伊薩聖殿等落腳城市的挫敗實例看到，無論是消極的漠視不處理、負面的剷除消滅，或是由上而下的大規模計畫，都不是正確務實的政策方向。

就前兩者而言，政府對落腳城市的漠視與剷除，無異於加劇國家內的階級不平等，斬斷向上流動的可能性，更可能造成無法收拾的社會問題。要進一步反省的是，政府對於落腳城市的政策擬定，若是缺乏了由下而上的草根意見反映，及政策施行成果的來回檢視，那麼原本良善立意的政策，都會釀成更大的災難。法國金字塔社區的經驗告訴我們，漠視落腳城市居民發展社會資本的需求而進行的大型徵地、社區營造、交通規劃及建築形態，只是為安置而安置，移民也無法建立有主體性的社群，進一步攫取更多資源。

委內瑞拉政府自 1999 年起在貝塔瑞實施的「玻利瓦革命」則是另一種極端。查維茲政權相信由上而下的資源挹注將會讓這個國家的落腳城市改頭換面，讓鄉村移民尊嚴站起，但對落腳城市的住民—追求翻身的人—而言，所欠缺的不是後端補助的多寡，而是先天體質的調養。委內瑞拉由上而下的資源挹注十分仰賴石油輸出的國庫收入，這種單一出口產品不但容易受到國際價格暴起暴落，更關鍵的因素是，迷信「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 的經濟政策無法確實增加落腳城市居民的社會資本。

夏曉鵬為我們展現了為移民由下而上的社區培力 (empowerment) 有多麼重要。高雄美濃這個客家小鎮，因政府長期偏重都市發展及農村產業空洞化，低技術臺灣男性難以在婚姻市場中找到伴侶，自 1990 年代開始，透過國際婚姻仲介，東南亞成為女性外籍配偶的大宗輸入國。這些外籍配偶透過婚姻移民來到人生地不熟的臺灣，在語言隔閡與文化差異下，與臺灣社會格格不入。

夏曉鵬和好友共同為這些外籍配偶成立了「外籍新娘識字班」，其

目的為認識中文為媒介，讓外籍配偶逐漸能自主發聲，進而形成組織，為自身爭取權益。這些外籍配偶逐漸卸下心防，透過中文的學習與述說，成為在異鄉生存的有力工具，美濃社區也逐漸接納她們為社區的一份子，夏曉鶯描繪一段感人的甜美融合圖像：

1997年夏天，在一期識字班結業之前，我們舉辦師生及家人一日遊的活動，行程中路過一伯公（客家人稱土地公廟），正值老人家午憩。老人見一群年輕人與在伯公下休息，告誡我們客家人的禮儀：「必須和伯公請安。」隨後，老人好奇地問我們從何處來？協會工作人員解釋，有許多是從東南亞嫁來美濃的媳婦，老人立即表示要帶我們向伯公請安，他誠心地祝禱：「伯公，這些是從很遠的南洋嫁來我們這裡的女孩，她們離家很遠，請伯公特別保佑她們在這裡平安。」

《落腳城市》所說的也是培力，只是 Doug Saunders 的培力講求的是從制度改革著手，國家應該做的不是將落腳城市隔離於原有城市，而是盡量讓不同文化及人群彼此接觸，賦權移民，建立其社會資本。這種賦權，如同西班牙政府對待摩洛哥移民，必須是由下而上的直接參與及公民審議，行政者應該於第一線了解移民者的需求，透過審慎的規劃，以設計最適當的方案。

陸、結語：我遷移，我發聲，我寫歷史

《落腳城市》書中的每一個城市，或成功或失敗，都是人類遷移史的獨特產品。本書以一個人道論述將這個城市的命運串聯起來：人類有遷移的自由，也有尊嚴生存的自由。我們可以藉由臺灣的移民史來看這個論述，自 17 世紀開始，臺灣先民就橫渡黑水溝來到這個島嶼，他們的遷移正是對原鄉生活的不滿足，遷移，不是對現實逃避，而是一種發聲的方式。為了追求身為人的價值及尊嚴，做出遷移的決定，並不是一

件是與否、對與錯的簡單抉擇，而是就諸多條件限制的權衡後所得出來的。

當代左派大師 Marcuse 曾經這樣解釋「解放」(emancipation)：「解放本來就預設了自由，唯有當個體能從宰制與壓抑的需求與利益中掙脫出來並因而成為自由的個人時，我們才能說人的解放、社會的解放達成了。」遷移本身與落腳城市也是一種人性的解放，他試圖擺脫原鄉的不平等，到新國度找尋自己的價值，這種文化衝擊對於一個人而言，也許是心靈的全盤洗滌。我第一次離鄉到臺北念書，發現臺北之於彰化，是一個如此繁華的大城市，但當我大學畢業到東京旅遊時，我更驚訝地內省：臺灣與日本之間，更是隔著半邊陲與核心國家的巨大差異。遷移到落腳城市這件事帶給人的影響，當然比短暫的求學及旅遊深刻得多。遷移者在漫長的人生終將會不斷地捫心自問：「我要成為怎樣的人？」，然後一步步地走下去。

國家所應該做的，不是輕蔑這些人的存在，視如草芥。放眼望去世界上偉大的全球城市，都是在多元文化的衝撞及融合下誕生的，我們一方面欣羨這些城市精神抖擻的生命力，也認為應該有那廣納百川的胸懷，那就是正視落腳城市的存在，將公民身分—進一步說，公民社會—的利基擴大堅實，讓翻身的工具確實下放給每個市民，為他們架設好展現才華的舞臺，告訴他們這個國家把每個人都當人看，勇於爭取自己的夢想。

我們若把落腳城市的居民視為公民一份子，給予他們成為中產階級的翻身機會，一方面這個國家的階級流動機會是廣開的，社會不平等才可能消緩，另一方面，明天這個國家未來的領導人，也可能是今天落腳城市的居民，他（她）勢必會比任何人都謙卑、願意傾聽，因為他（她）曾經努力奮鬥過，嘗過苦難的滋味。